

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实践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基于青年环保人的案例分析

■ 钟兴菊 胡丹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044)

【摘要】基于个体化理论与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对12位青年环保人进行深度案例分析,通过个体、组织与行业间的互构实践揭示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机制以及多层次归因的分析框架:一是多元化“名义抗争”的环保初心与情怀成为进入环保领域的开端;二是以双重“使命合一”的动态博弈推动组织化环境行为的发展;三是基于环境正义边界拓展构建多层次治理“共同体”,推动环保行业的认同与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与组织双重生命历程的互构发展路径。本文从互构视角动态勾勒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生命历程图景,为从组织化视角探索环境治理共同体路径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参考。

【关键词】个体化 后物质主义 互构 青年环保人

一、研究缘起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带头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共建生态文明,共创美丽中国”,这为青年人才参与环境保护以及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机遇与契机。以2000年前后涌现的大学生环保社团热潮为起点,环境社会组织经历了从“职业化—合法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的阶段演变。本文将“青年环保人”的出生时间限定为20世纪80—90年代^①,他们中的大部分具有大学环保社团经历。这些青年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青年作为社会亚文化先锋,预示着社会精神文化变迁的方向^[1],代际更替使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推动社会价值观更迭;二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代青年”^[2],作为独生子女的第一代以及使用互联网的先锋群体,具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追求^[3],在择业

收稿日期:2022-03-09

作者简介:钟兴菊,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员,硕士生导师,重庆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骨干成员,主要研究环境社会学;

胡丹,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环境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公众环境健康风险感知与应对研究”(课题编号:19BSH07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技创新专项“‘以公众之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策略选择”(课题编号:2019CD-JSK01XK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青年年龄范畴界定不一,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为15—44周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16—45周岁,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规定为14—35周岁。为了保证案例样本信息的饱和性,对环保行业发展阶段过程进行建构,结合中国环保组织发展背景以及国际现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出生于1980—1990年的青年环保人,截至目前年龄段为31—41岁。

过程中彰显出个体化与自我意识。

学界关于青年环保人推动环保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视角。一是后物质主义视角,认为社会经济水平与后物质主义呈正相关关系^[4],当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公众更加重视环境保护^[5],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高环境风险感知以及环境抗争行为呈正相关关系^[6],同时积极的政治参与可以提升环境行为意愿^[7]。二是规范激活理论视角,认为将环境问题原因、后果归咎于自己时,会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8]。有研究认为,个体价值观影响环境信念与行动^[9];另有研究认为,环境保护知识、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与环境风险认知对环境行为影响显著^[10];此外青年群体虽有较高的环境意识水平,但为环保付费的意识比较薄弱^[11]。三是低成本理论,认为环境保护行为受行为成本影响。环境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力取决于成本强度^[12];利己主义模型考虑个人环保行为成本和利益,当利益大于成本时具有积极的环保行为^[13]。由此可见,既有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对青年环保行为与环境意识、态度、认知以及价值观等因素的分析,而较少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环境行为的关系进行探讨;另一方面侧重于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组织运行或微观环保个体维度的碎片化讨论,缺乏以动态过程视角建立多层次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分析。

基于实地调查发现青年环保人与组织发展历程凸显出多重张力:从事环保行业(尤其是工业污染防治议题)风险大、工资低、流动性强、社会认可度不高等,然而为何部分青年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环保行业;或“离开”后又“重返”环保行业;甚至自掏腰包成立环保组织等?为此,本研究以“80后”青年环保人为研究对象,运用深度访谈方法收集12位环保人生命历程的一手资料,基于个体化理论与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构建“个体名义抗争—使命合一—博弈—环境正义拓展”的可持续环境行为的归因分析框架,以青年环保人的生命历程反观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弥合路径。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个体化理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乌尔里希·贝克基于自反性现代化提出个体化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去传统化”不断削弱传统集体在社会中的形成^[14];二是“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态度和模式从边缘向中心靠拢^[15]。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的个体化道路是经济改革发展带来的逆序过程,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制度个体化,随着劳动力市场、职业发展等领域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进取的自我”;二是主观个体化,随着情感和欲望的重要性提升而产生的“欲望的自我”^[16]。其次,英格尔哈特在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中提出后物质主义理论,强调个人追求向物质之外的多元化领域延伸,包括关注环境保护而较少关注经济回报,倾向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参与,重视生活质量与自我实现等^[17],为环境风险社会背景下探索实现“欲望的自我”以及“进取的自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此外,社会互构论关注个人与社会主体间互构共变的动态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实践主体的互动关系、类型、过程、机制与条件等的探索,实现多元主体的差异化发展路径^[18]。为了建立青年环保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个体化选择视角之间的关联,本文根据互构论视角分析个体对环境的关心向环境友好行为的转变,以及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

本研究是从个体与组织层面动态分析环境友好行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一方面以个体化与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勾勒青年环保人环境友好行为选择的路径;另一方面以互构论视角动态分析个体环境友好行为与环境社会组织互构共变,并推动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以“环保人的名义抗争—组织发展的‘使命合一’—环境正义共同体构建”为基础的双重生命历程互构过程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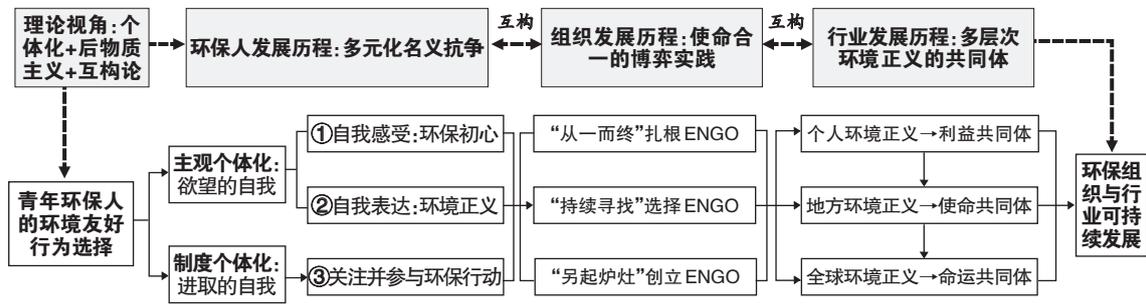


图1 青年环保人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实践过程与机制的分析框架

社会组织的案例研究,能够对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实践者行动逻辑进行纵深描述,解释既有现象的形成和运行过程^[19]。本文通过三种方式收集文本资料:(1)深度访谈,2018年7-11月课题组对绿石、绿色江南、青赣等10余家环境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2-4小时不等的半结构式访谈;(2)参与式观察与访谈,2019年3-6月通过参与太平洋环境资源中心组织召开的社会组织资助伙伴年会,进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3)口述史访谈,2020年4-10月课题组以绿石环境保护中心成立20周年为契机,对组织发展重要人物进行口述史访谈,共收集12位访谈对象关于个人环保生命历程与组织发展过程的一手资料(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受访人 ^①	年龄	职业历程	现工作机构	环保职业状态	访谈对象编码
1	FYJ	41	企业→环保	绿色江南	全职	20180817FYJ
2	CB	31	环保	绿色江南	全职	20201111CB 20201112CB
3	ZDG	31	环保	深圳零废弃联盟	全职	20181112ZDG
4	LN	35	医生→环保	莫愁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全职	20180821LN
5	LSN	33	环保	绿色潇湘	全职	20190330LSN
6	SC	34	环保	绿色潇湘	全职	20190610SC
7	YX	37	环保	大自然保护协会	全职	20200708YX
8	WHL	41	媒体→环保	合一绿学院	离开后回来	20200714WHL
9	XB	33	企业→环保	绿石环境保护中心	离开后回来	20200616XB
10	WYL	31	企业→环保	摆脱塑缚	离开后回来	20200710WYL
11	LD	32	政府→环保	绿色江赣	离开后回来	20181116LD
12	ZCQ	37	环保→企业	房地产企业	离开后持续支持	20200718ZCQ

三、青年环保人环境友好行为实践的多阶段演化与解读

伴随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时代青年更加追求物质之外的价值目标,在求职中呈现“去传统化”的特征。研究发现,青年环保人的职业选择路径与社会组织发展过程表现为三个阶段的互构实践:一是以多重“名义抗争”的环保初心形塑个体化环境友好行为;二是以

① 遵循田野研究的既有规范,本文获得环境社会组织负责人同意对组织名称不做匿名化处理,而对调研所涉及的人物姓名都做了技术处理,采用“访谈时间”(六位)+“访谈对象姓名首字母”进行替代。

双重“使命合一”的动态博弈实践,建构组织化的可持续环境行为;三是以不断拓展的环境正义边界建立多元化环境治理共同体,从而形成从“个体环保意识”到“组织化环保行为”再到“环境治理共同体”的闭环路径。

(一)青年进入环保领域的起点:基于多元化“名义抗争”的环保情怀实践

环境风险受害者通过“依法抗争”^[20]“依势抗争”^[21]和“表演性抗争”^[22]表达利益诉求,实现环境维权目的。生于和平年代并成长于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背景下的青年环保人,其环境友好行为凸显出“为名义抗争”的特点,表现为三种名义的抗争类型:一是以自然为名义的抗争;二是以环境不公为名义的抗争;三是以实现自我价值为名义的抗争。

1. 以自然为名义的抗争

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且成年后不易发生改变。首先,童年时期与环境嬉戏互动的美好记忆与当前“寂静的河流”形成鲜明对比,使青年环保人萌生投身于保护“青山绿水”的环保初心。小时候老家的河底有河蚌,青石板上吸附着螺蛳,现在去看安安静静,一只螺蛳、一只河蚌都没有,是“寂静的河流”。我希望它能恢复,由此保护环境的观念逐渐萌芽。(访谈对象:20200714WHL)其次,作为污染受害者而关注环境议题,并尝试通过参与环保实践来推动改变。我们镇曾有个药棉厂没有污水净化设备,刺鼻、酱红的水直接排到河道里。改变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入环保社团。(访谈对象:20200718ZCQ)此外,他人的认可与激励不断强化环保人的初心。对自然的兴趣而获得身份感、自信心以及荣誉感,成为环保人求职环保领域的底层代码。我最骄傲的身份曾是自然课代表,后来在加拿大读书时接触到非营利组织,从此我的职业与NGO结缘。(访谈对象:20200708YX)

2. 以环境不公为名义的抗争

童年时期埋下热爱自然的种子随着环保人的成长生根发芽。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人转向以“环境不公”为名义进行抗争,并拓展环保行动的边界。一方面,环保行动从以“大爱”之名走向以“环境不公”为名义的抗争之路。新生代青年环保人更关注区域性的环境污染议题,并通过“联合行动”倡导环境友好行为。老一代环保人做环保是因为爱汉江,而我们不要环境被污染,出发点不是爱而是不公,是去争取权利和平等。(访谈对象:20200616XB)另一方面,青年环保人主张为公共利益发声,甚至抑制自身偏好^[23]。误入环保人生路的“奇途”是因为帮助公众发声,保护环境与成就他人成为环保人的基因。进入环保行业是因为支持帮助他人是我的基因。这个社会需要我们代表公众发声,一直认为自己是误入“奇途”。(访谈对象:20180817FYJ)

3. 以自我价值实现为名义的抗争

现代社会理性化的发展推动公共领域空间的转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关注对自我感受与表达的追求,青年环保人以环境社会组织作为自我价值实现与多重意义建构的载体。首先,青年环保人早期以“热爱”或“不公”为名义的环境抗争突破地域边界,实现个人职业生涯与环保行业的融合发展。坚持做环保是因为我希望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见证环保行业的发展,成为行业的先驱。(访谈对象:20200616XB)其次,因为兴趣与改变社会的价值追求,环保青年进入“喜欢但不挣钱”的环保行业,多维度诠释了“有意义”以及“成就感”的职业意涵。我认为大致有四种人生选择:一是选择有钱又喜欢的事;二是钱多,但不喜欢的事;三是既不喜欢又不挣钱的事;环保是第四种,喜欢却不挣钱的事,但环保是去改变社会,更有意义。(访谈对象:20200714WHL)最后,创新性是环保人职业成就感与满足感的来源。环保人不喜欢一成不变,更喜欢从“0到1”突破的创新感,不断追求更高的职业目标。我更喜欢0到1的突破与刺激,也需要有上升空间,而环保领域给了我们大胆创新的平台与机会。(访谈

对象:20181112ZDG)

青年环保人作为环境变迁的亲历者或污染受害者,源于热爱大自然的天性形成自发的环保行动;伴随环境风险加剧,逐渐转向“环境不公”为名义的公域环保实践;继而以环保实践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对“自我价值”进行多维度解读,从而构建个人职业生涯与环保组织发展的融合路径。为此,对青年环保人情怀的多维度解读实质上回答了“青年人为什么进入环保行业”的核心问题。然而,如何通过“使命合一”的环保实践,实现环境友好行为的组织化发展?

(二)组织化环境行为的转型发展:基于双重“使命合一”的动态博弈实践

随着现代社会“去传统化”发展,有些原本依靠集体应对的问题转向由个体承担。政府职能的转移与社会发展为民间环保组织创造了行动空间^[24]。为此,环境社会组织成为青年环保人情怀落地实践的重要场域与载体。实地研究表明,环保人与环境社会组织发展凸显出双重“使命合一”的动态博弈过程,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承诺一瞬间,践行一辈子”的完美匹配型;二是“蓦然回首,一拍即合”的辗转选择型;三是“另起炉灶,安放初心”的发展创造型。

1.“承诺一瞬间,践行一辈子”的完美融合型

环境社会组织成为青年环保人初心实践的“试验田”,以“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贼船下不来”的承诺,促成环保人“践行一辈子”的环保人生路。首先,环保人通过环境社会组织延续个体化环保实践,将环境社会组织作为个人初心的“试验田”,在互动博弈过程中,个人初心与组织使命感不断得到认同与强化。因为我有许多想法,或者怀疑约定俗成的道理,所以我把绿石当作试验田,用它去尝试。(访谈对象:20200616XB)其次,成功经验的不断强化以及行动的及时反馈推动环保人实践的可持续性。我能够看到越来越接近预想目标,这种刺激让我想把它做得更好。(访谈对象:20201112CB)最后,环保人以一辈子践行一件“喜欢”且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拓展自我价值。承诺是一瞬间,但需要一辈子来践行,而且如果一辈子一件喜欢的事都没有做,会很遗憾。(访谈对象:20180817FYJ)

2.“蓦然回首,一拍即合”的辗转选择型

青年环保人在“环保小世界”中辗转流动,试图通过博弈实践找到安放个人环保初心的组织载体,最终实现“蓦然回首,一拍即合”。以价值观为行动导向的青年环保人与环境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三重张力。一是选择自由平等型与家长制管理型组织的张力。环保人要么选择“手把手”平等成长的组织氛围,能够依照原生的个性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要么选择拥有文化影响力、政治资本与社会网络的“个人魅力型”的家长制管理风格的组织。环保行业给新人很多培训机会,老一辈手把手带着成长,新人慢慢对环保行业产生了认同感。我之前机构的老师更像家长制,是个人魅力型极强的管理风格,我不喜欢所以离开了。(访谈对象:20190330LSN)二是追求个人成就感与组织发展前景的张力。青年环保人的成就感来源于职业发展空间以及组织发展前景等。由于晋升渠道与发展空间受限,环保组织容易出现“小脚穿大鞋”或“天花板效应”现象,导致人才的“跳槽”。很多世界顶级大学的研究生到绿色和平两三个月就离开,就是因为事务性的工作难以凸显他们知识储备的优越性。(访谈对象:20181112ZDG)为了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社会组织通过订单式培养建立环保储备人才库以留住人才。我们会定向资助培养技术人才,承担部分费用推荐去国际学校深造,毕业后他们更愿意留在机构。(访谈对象:20181112ZDG)三是选择作为螺丝钉与追求创新性行动的张力。面对环境风险的挑战,青年环保人热衷以创新性行动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不甘做循规蹈矩的“螺丝钉”,突破“程序化”的人生重拾环保初心,实现“一拍即合”。2016年我从政府出来创立名为青赣的社会组织,父母很不理解。我认为社会组织做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创新实验,不能保证成功,但一定能有发现。(访谈对象:20181116LD)

3. “另起炉灶,安放使命”的发展创造型

青年环保人的环保初心在成长过程中,或因水土不服而“另起炉灶”,或以“不在场的在场”方式支持组织的发展壮大。一是因为坚守环保初心而创立新的组织。环保人本着“不将就、不妥协”的原则,带着资源“另起炉灶”安放初心。以前“绿石军校”每年都有面向社团负责人的培训,出来很多人才。我毕业后兼职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域协调人,成立合一绿学院,与绿石成就他人、赋能核心志愿者的基因相似。(访谈对象:20200714WHL)二是基于价值认同,环保人以“不在场的在场”方式持续支持组织发展。离开环境社会组织的环保人通过贡献时间、项目筹款、专业支持以及理念传播等“不在场”的方式延续个人环保情怀与组织使命。离开后我经常做志愿者或者发动捐款;组织的理事小可在企业做EHS,用掌握的专业资源反哺我们。(访谈对象:20200718ZCQ;20200616XB)

整体来看,青年环保人与环境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是双重“使命”的动态平衡实践:坚守初心的环保人可能成为“从一而终”的幸运儿,也可能在“环保小世界”中辗转“跳槽”,最终“一拍即合”找到安放个人使命的归属,也可能因为“不将就”创立新的组织。由此可见,个人初心与组织使命的博弈实践过程,实质上回答了“组织化的环境友好行为何以可持续”的核心问题。此外,环保圈中的人才“流失”现象实质上是环保人在“环保小世界”中的流动,而非真正的流失。然而,环保人与社会组织的双重“使命”的互构实践如何进一步推动行业认同与可持续发展?

(三)环保行业认同与可持续发展:基于环境正义边界拓展建构多元化的治理共同体实践

环境正义与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相关性,青年人的环境正义行动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个人环境正义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自由地奔跑与呼吸”;二是以地方环境正义构建使命共同体,倡导“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三是以全球环境正义构建命运共同体,拓展“不能只保护半个地球”的联合行动。通过“个体—组织—行业”的多层次共同体实践,突破环境社会组织发展的时空约束,从而形成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闭环路径。

1. 基于个人环境正义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自由地奔跑与呼吸”

面对严峻的环境风险,与“沉默的大多数”公众不同,青年环保人重新审视财富与健康的关系,为后代争取环境权利的责任感使其坚定环保信念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以个人环境正义为基础的治理实践的治理实践。PM2.5超标导致孩子连体育运动都不能进行,我希望孩子可以自由奔跑与呼吸。(访谈对象:20180821LN)环境受害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碎片化的“单兵作战”的抗争,环境正义凸显出“环境私利维权”或“个体化自救”特点。刚开始逐户识别污染企业,向环保部门举报,与企业谈判,通过媒体曝光,从刚开始的一群人,走到最后就剩我自己。(访谈对象:20180817FYJ)

2. 基于地方环境正义构建使命共同体,促进“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

环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跨区域性以及长期性特征。由于碎片化的“游击战”效果不佳,关心公共事务的公众逐渐转向从事组织化的实践。传统“爱管闲事”的民间环保领袖逐渐成为组织化行动的倡导者,以家乡情结或地域性认同为基础,动员公众参与环境正义行动。他们是一个布衣,是心忧天下的典型。我们的创始人张老师社会责任感强,哪里有环境问题,公众都给他打电话。(访谈对象:20190330LSN)此外,由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利益关联性等特点,以“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为宗旨,随着河流延伸形成“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民间环保使命共同体。在湘、资、沅、澧沿岸招募了近500名在地志愿者,组成扎根本地的河流守望者网络,并在关键时期给予支持和陪伴,赋予环保行动“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的新内涵。(访谈对象:20190610SC)

3. 基于全球环境正义建构命运共同体,实现“不能只保护半个地球”的联合行动

环境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决定其将超越地理界限,不可逆转更无可逃避^[25],环境治理必然走向全球的联合行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的青年环保人以“不能只保护半个地球”的全球环境正义为目标,涌现出关注全球环境风险的社会组织。我们认为保护半个地球犹如扑灭一半火焰,无益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访谈对象:20200714WHL)一方面,全球环境污染通过供应链传播,超越地域,导致以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机制失效。社会组织运用绿色供应链工具介入全球环境治理实践。某纺织印染厂COD超标且不整改,我们给他的客户阿迪达斯致信,结果他被停单三年,直到污水处理厂建好后才恢复。订单是企业的生命线,这种方法特别有效。(访谈对象:20201111CB)另一方面,在“双碳”背景下,青年环保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议题,成为推动个人与行业绿色变革的全球行动者。2007年建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网络,后来发展成为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每年组织中国青年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代表中国在全球发声^①,以全球环境正义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同助力实现“零碳未来”目标。

青年环保人的环保初心与组织使命互构实践推动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历程首先表现为环境正义的多层次解读与跨越式发展:主张生存环境权利的个人环境正义抗争—“不要在我家后院”的地方环境正义行动—“保护整个地球”的全球环境正义倡导;其次,以环境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多元共同体网络突破地域与国家边界,推动环保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认同。多层次环境正义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回答了“环保行业何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从而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时代内涵。

研究发现,环境友好行为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凸显“个体—组织—行业”的多层次动态互构过程,即以多重“名义抗争”的环保情怀作为环境友好行为的起点,进而以“使命合一”的博弈实践形塑组织化环境行为,最终以环境正义边界拓展建立多元化环境治理共同体,从而回答“青年人为何进入环保圈”“组织化环境友好行为以及环保行业何以可持续”等问题(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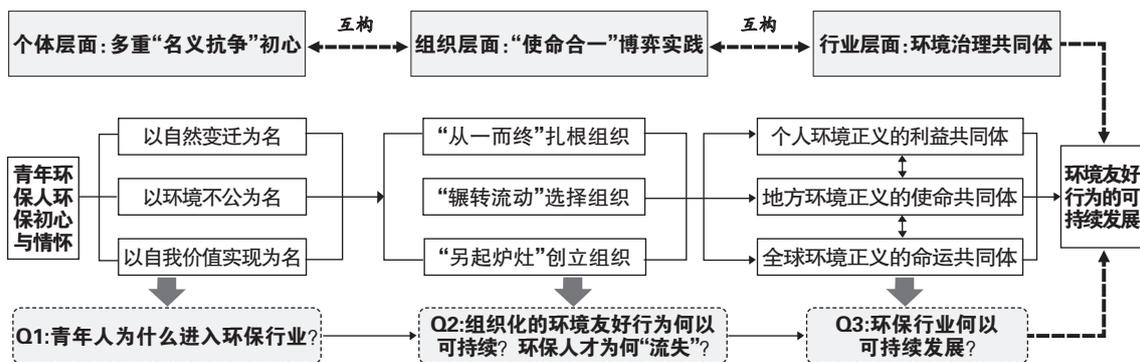


图2 环境友好行为实践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与机制

四、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机制分析

面对社会转型与复合型环境风险,社会组织与公众已然成为环境多元治理的重要参与主

① 资料来源: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官网<http://www.cycan.org>。

体。基于互构论视角构建“个体—组织”双重生命历程的分析框架,探索青年环保人的环境友好行为转向行业可持续发展过程的多重机制:一是从系统性视角考察环境关心转向环境行为的多阶段发展逻辑;二是后物质主义视角引领“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选择与组织化环境友好实践的动态平衡;三是基于环境正义边界拓展构建多层次治理共同体实践,形成整体性的联动治理,最终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一)建构环境关心转向环境行为的动态阶段性与整体性发展逻辑

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的复杂关系呈现出两大竞争性观点:“统一性”观点认为环境行为是环境关心的内涵维度之一^[26],而“独立性”观点侧重探讨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相关关系^[27]。多数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并非存在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本研究基于青年环保人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发展过程,重点考察环境关心的内容结构如何实现向环境行为转化的动态演化过程。首先,青年环保人的情怀是“环保种子”启蒙的前提,从而找到“为什么选择做环保”的答案。其次,通过“个体化初心”与“组织化使命”的动态博弈实践,回答环保人“为什么创立、加入环保组织”的核心问题。最后,基于时空与地域差异背景,不同群体对环境正义价值蕴涵着强大的认同动力。环境社会组织通过突破地域边界形塑“环境正义共同体”的实践,从而探寻“环保行业认同何以形成”的路径。从“环保人”到“环保行业”的动态演化过程,将青年环保人的情怀解读为“组织化”的使命与“行业化”的正义实践,从而凸显环境关心转向环境友好行为的阶段性与整体性发展逻辑。

(二)后物质主义视角引领个体化选择转向组织化环境行为发展

个体化社会冲击了传统集体的文化价值观,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以及认同的创造者^[28]。后工业社会中不断富足的物质财富促使个体关注公共事务以及形成自我感受与自我表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青年环保人在职业选择中凸显“进取的自我”与“欲望的自我”,从而勾勒出“为自己而活”的生命历程图景。一方面,以“进取的自我”自居的青年环保人将环保作为“我的事”,他们拥有家国情怀且“爱管闲事”,认为环保是终其一生的正义事业,在持续的环境抗争中获得自我满足感与成就感;另一方面,以组织化的创新实践实现“欲望的自我”,青年环保人因为“不将就、不妥协”找寻与个人初心匹配的组织化载体,通过弥合多重张力最终形塑“从一而终”的幸运儿,“蓦然回首”的归属选择以及创立新兴组织的三种实践形态。为此,后物质主义视角为青年环保人提供了关注公共事务与环保正义事业的内容载体与组织化行动方向,实现“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选择与环境友好的组织化实践的动态平衡,进一步廓清对青年环保人在环保“小世界”中的“流动”,而非人才“流失”的领悟。

(三)基于环境正义边界的拓展实践构建多层次的“治理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为了搭建多层次环境关心与多元化环境行为实践的转化平台,环境社会组织与青年环保人以多层次环境正义实践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共同体,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多层次的环境治理体系。基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组织地域性边界的制约,青年环保人通过“个人—地方—全球”三大环境正义层次拓展实践空间,形成“全方面、多层次、可持续”的环境治理共同体:一是为了孩子能够“自由地奔跑与呼吸”,以个人环境正义实践构建利益共同体;二是基于“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的宗旨,以地方性环境正义构建“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使命共同体,形成一张可持续的“民间环境保护网”;三是以“保护整个地球”的全球环境正义为目标构建命运共同体,从而通过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突破组织、地域以及国家边界,构建全球性的“治理共同体”。由此可见,通过环境正义边界拓展形成个体利益共同体—地域使命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治理实践体系,为组织化环境友好行为推动环保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四)建构“个体—组织”双重环保生命历程互构实践的动态分析框架

青年环保人与环境社会组织的微观发展历程实质上是环保行业发展的表征。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历史时间和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研究表明,从青年环保人的初心萌芽到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凸显为“双重生命历程”的互构实践:个体环保生命历程与环保组织行业发展过程相互印证与促进,个体化环保情怀与组织化使命“合一”实践拓展环境正义的边界与共同体建构,从微观个体职业生涯选择反观环保行业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过程。基于后物质主义以及个体化理论构建“个体—组织”互构实践的动态分析框架,有利于突破个体性环境关心,组织化环保实践以及行业发展认同的制度性、地域性以及群体性的制约。结合宏观与微观视角对青年环保人、社会组织与环保行业共同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实践过程进行整体性分析,为个体化环境行为与组织化实践的结构制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不仅如此,青年环保人职业生涯与社会组织发展变迁的互构实践为环境关心如何转化为环境行为,组织化环境行为如何突破多重时空制约构建治理共同体,并最终推动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了经验性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回答“环境关心如何转向环境友好行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基于青年环保人的生命历程,从动态过程视角回答了“环保人为什么进入环保组织”“组织化环保行动何以可能”“环保行业如何得以认同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对环保行业发展历程的宏大叙事佐以微观青年环保人的生命历程补充,也即尝试以青年环保人的环境友好行为发展历程反观环保组织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在复合型环境风险背景下,根据后物质主义与个体化理论视角,本研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12位青年环保人的生命历程研究发现:首先,个体与组织间的互构实践推动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体现为从“个体化—组织化—共同体”的三阶段过程;其次,为了实现“使命合一”的实践,环保人在环保“小世界”中辗转流动,为环保人的“流失”现象赋予新的含意;最后,通过双重生命历程构建“个体—组织”互构实践的分析框架,从动态过程视角探索个体化环境关心走向有序组织化的环保实践,并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与认同的闭环路径,从而弥补既有研究中环保行动者与社会结构制约之间的断裂性与静态性分析的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互构论视角动态勾勒可持续环保实践的个体化与组织化的多重生命历程图景,为从组织化视角探索环境治理共同体实践路径提供理论与现实参考。然而以下三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思考:一是对环保事业如何影响公众环境关心形成“闭环式”可持续环保行为机制缺乏多因素探讨;二是对于大部分离开环保领域仍然以多种方式继续支持环境社会组织发展的群体,其作用与功能定位缺乏系统性分析;三是对多层次环境正义构建的共同体间如何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联合实践过程机制缺乏整体性探讨。

[参 考 文 献]

- [1] 沈 杰:《世代理论视域中“80后”在巨变时代的自我确证》,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 [2] 杨 雄:《“第五代人”:自身特点与发展趋势》,载《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3期。
- [3] 李春玲:《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4] Novy M., Smith M. L., et al. Inglehart's Scarcity Hypothesis Revisited: Is Postmaterialism a Macro or Micro-level Phenome-

non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17, (6).

- [5] 胡建国 裴 豫:《中国公众环境意识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的研究》,载《晋阳学刊》,2019年第3期。
- [6] 洪大用 范叶超:《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的国际比较及其理论启示》,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6期。
- [7] 王晓楠 瞿小敏:《生态对话视阈下的中国居民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年CSS数据的实证分析》,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3期。
- [8] Schwartz S. H..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p.221 – 279.
- [9] 孙 岩 武春友:《环境行为理论研究评述》,载《科研管理》,2007年第3期。
- [10] 彭远春:《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 [11] 刘森林:《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环境意识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年数据》,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5期。
- [12] Diekmann A., Preisendorfer P., Green , et al..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Low-Cost and High-Cost Situations.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003, (4).
- [13] Stern P. C.. *Psych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
- [14] 乌尔里希·贝克 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6页。
- [15]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 [16]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 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69-371页。
- [17] 罗纳德·英格格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39页。
- [18] 杨 敏 郑杭生:《社会互构论: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 [19] 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原书第5版)》,周海涛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 [20] O'Brien K.J., Li L.J..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1996, (1).
- [21] 应 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7-227页。
- [22] 曾繁旭 黄广生 李艳红:《媒体抗争的阶级化:农民与中产的比较》,载《东南学术》,2012年第2期。
- [23] Sagoff M.. *The Economy of the Earth: Philosophy, Law and the Environ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8.
- [24] 洪大用:《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6页。
- [25] Beck U. *Risk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2, pp.20 – 25.
- [26] 洪大用:《公民环境意识的综合评判及抽样分析》,载《科技导报》,1998年第9期。
- [27] Hines J. M., Hungerford H. R., et al..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87, (2).
- [28] 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责任编辑:刘彦)